

“创造的教育”：历史比较与东师印记

2017-04-19

【编者按：“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全国人大代表、我校校长刘益春的“创造的教育”理念予以关注。2016年，我校在“尊重的教育”理念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创造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也彰显了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2016年9月开始，党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社会科学处联合向全校师生征稿，对这一教育理念进行深入阐释和解读。截至目前，已收到百余位专家学者、部处负责人、部分师生的文章，学校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汇总、编辑，出版《创造的教育》一书。近期，“东师新闻”栏目将陆续刊发这些文章，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党委宣传部部长、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严蔚刚

先对题目做一点解释。

对“创造的教育”理念的理解，至少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针对“创造的教育”本身进行剖析，目前对这一理念的理解集中在围绕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创造能力和创造习惯的目标，从“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环境如何营造”等方面诠释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另一种是比较“创造的教育”理念与其他相关理念的关系，在比较中逐步加深认识。这里尝试着做后一种理解。

当前我国高校办学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创新型人才培养能力的不足与国家社会对创新型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创造的教育”理念的提出契合了国家需要、时代精神和大学内涵式发展的要求。而“创造的教育”由东师提出，与东师的办学历史、办学特色和办学目标密切相关，也使这一教育理念，无论是在形式表述还是内涵阐发上都烙上了东师印记。这里无意把“创造的教育”理解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希望把“创造的教育”的东师印记试着做一些阐述。

“创造的教育”与“尊重的教育”

提起“创造的教育”理念，东师人会很容易想到新世纪之初学校提出的“尊重的教育”理念。我认为，两者都有着鲜明的东师印记——“尊重的教育”本就是针对当时基础教育存在的不尊重学生的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而这与师范大学

的教师教育办学特色密切相关；而“创造的教育”单是从形式表述上就传承了“尊重的教育”的句式特点，在内涵上，“创造的教育”强调“师范特色”，作为国立师范大学，既承担着和其他高水平大学一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同时肩负着培养创新型卓越教师和未来教育家的使命，而后者对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人才培养而言更加具有战略性基础地位。

关于“创造的教育”与“尊重的教育”，我认为两者是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具体之，“尊重的教育”是基础，是源，更加具有普遍性；“创造的教育”是发展，是流，更加具有时代性。

“尊重的教育”的基本内涵是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人性，尊重教育者的劳动成果，其核心是尊重人性。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都是基于人性基础上的凝练总结。那么“人性”是什么呢？人性就其内容而言，是一个囊括了各种成分的复杂物。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恶”，告子的“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英国洛克的人性“白板说”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恰好说明了人性的复杂。人性向哪个方面发展的可能性都有，关键是给予人性什么样的生长环境，这也铸就了人与人之间千姿百态的面貌。简言之，“尊重的教育”的核心是尊重人性，尊重复杂的包括了各种可能性的人性，尊重每一个都不尽相同的个体，尊重他们自由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尊重的教育”并没有明确给出人性的发展方向，只是说要尊重，尊重各种可能性。

“创造的教育”则明确地提出来，要发展人性中的创造性。人性是丰富多彩的，人性中包括了人的创造性、破坏性及其保守性，也包括人的善良、勇敢、正义、诚信、幸福、快乐等及它们的相反面。在不同的条件下，基于不同的问题，出于不同的目的，可能会提出不同的教育理念。比如，针对学生的苦闷、彷徨、怯懦等提出“快乐的教育”“幸福的教育”“勇敢的教育”等等，它们都是在强调发展人性的某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理念与“创造的教育”在同一个层面上。而它们的共通之处是，都可以在“尊重的教育”基础上合乎逻辑地生发出来。

至此联想到，东师附小目前正在于伟教授的领导下大力倡导、积极践行“率性教育”。我认为，“率性教育”本质上与“尊重的教育”在一个层面上，“率

性”之“性”具有全息性，并没有指出具体的发展方向。这对于处于发展之中、具有各种可能性的小学生而言是十分恰当的。

因此，“尊重的教育”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教育要建立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之上。“创造的教育”则指出了一个具体方向，即发展人的创造性，这是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所以，两者是传承与发展、源与流、原则性与目标性之间的关系。需要提出的是，“创造的教育”不仅有基于外在需要的工具理性的考量，也有基于人自身发展的目的理性的意蕴，是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

东师“创造的教育”与陶行知“创造的教育”

追溯历史，可知“创造的教育”（或类似提法）在中外教育史上皆有所提及。国外的“创造学”发轫于美国，主要从心理、生理、脑科学等视角研究创造过程的科学机理、探讨教育与创造力的关系。国内倡导“创造的教育”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解放之前的陶行知先生和改革开放之后的刘道玉先生。

陶行知是我国创造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的“创造的教育”思想与其试验主义、“教学做合一”等思想是贯通融合的。1917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成回国，执教南京高等师范和任职中华教育改进社，大力提倡科学方法与试验主义。他把试验和试验主义与教育革新、甚至与民族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这个时期他的主要著述有《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试验主义与新教育》《试验教育的实施》等。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陶行知积极开展教育实践，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和上海山海工学团，提出“先行后知”“教学做合一”理论，强调做与行的重要性，倡导手脑并用。这一时期主要著述有《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做学做合一之总解释》《我国教育出路》《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式提出“创造的教育”，主要著述有《创造的教育》《创造宣言》《创造的儿童教育》《创造的社会教育》等。

陶先生“创造的教育”是在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他本人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的情怀。他在《目前中国教育的两条路线》中提出，“中国现在危机四伏，存亡一缕。做成这个的原因，就是这山穷水尽的传统教育。我们要挽回国家的危亡，必须打破传统的教育而寻生路。”陶行知提出“创造的教育”，针对的是“传统的教育”。陶行知对中国传统教育有着深刻的洞察力，概括起来

关键字就是“死”，教员教死书，学生读死书，只有玄想，没有行动。所以，陶行知希望教育能够“活”起来、“动”起来。他提出的“创造的教育”是一个体系，贯穿这个体系的是试验、行动、创造。陶先生把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改为“社会即学校”，认为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把学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在社会中办学，而不单单在学校中办学，其目的就是要积极行动，改造社会，而不是坐而论道。“创造的教育包括物质的创造和心理的创造，凡所创造，必在于有所行动”。而高质量的行动就是创造，“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教劳心者劳力——教读书的人做工；教劳力者劳心——教做工的人读书。”只有手脑并用，才能开天辟地，创造一切。可见，陶行知的“创造的教育”与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是贯通融合的，核心是“做”。陶行知的“创造的教育”思想不是在资料堆中冥思苦想的产物，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办学实践，在与传统教育的弊端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不断磨砺出来的教育思想。

那么今天东师提出的“创造的教育”与陶行知“创造的教育”有何异同呢？我认为共通之处在于：两者都在响应国家所需，回答时代课题；两者都倡导尊重人的本性，发展人的创造力，强调实践出真知、出创造。不同之处在于：因时代不同，国家所需亦不同，陶行知时代的焦点问题是国家的生死存亡和社会民众的启蒙与觉悟；而如今的时代焦点问题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缺乏问题。陶行知的“创造的教育”，面对的人群更为广泛（社会中人，包括儿童），面对的课题更为宽泛（主要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东师提出的“创造的教育”，面对的人群主要是大学生，面对的课题主要在教育领域内部，特别是在“教与学”的环节上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的问题。

东师“创造的教育”与刘道玉“创造教育”

刘道玉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创造教育”，已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出有“创造教育书系”5本（《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教育新论》《创造：一流大学之魂》《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分别反映了他在创造教育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等方面的基本观点和心得体会。

刘道玉提出“创造教育”，其背景是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重新起步，中央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改革在深化中遇到了较大阻力，归结为一个“旧”字，“用旧思想来指导新的改革，用旧标准衡量新型人才，用旧方法教授新内容，用旧眼光看待新事物。”如何让“旧”的教育“新起来”，“创造教育”由此酝酿诞生。刘道玉认为“创造教育的本质，就是优化教育，发展人的最优秀本质。”“创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创造型人才。”“创造力的培养应重点放在观察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上。”教师在“创造性教学”中要多运用“发现式”“讨论式”“疑问式”等教学方法，学生是“创造性学习”的主体，要加强“自我设计”。他早期立足武汉大学，比较系统地探索综合性大学应该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问题，在武汉大学相继推动了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改革，领一时风气之先。

东师“创造的教育”与刘道玉“创造教育”相比，两者在旨趣和内涵上有较高的相似度。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创新人才十分匮乏，被压抑的新思想新行为一下子迸发出来，那时刘道玉提出“创造教育”响应了时代要求和学生心声。如今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洗礼，从某种意义上讲，创造本应不是一个稀缺的事物，但事实是，创造在功利主义、量化至上的思想侵蚀下变得相对稀缺，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今天需要的创造是更高质量的创造，是在国际舞台中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原创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创造。所以，两者都把焦点放在了大学和大学生这个最具创造力的组织和群体上面，放在了“创造性的教”与“创造性的学”这个关系创造性人才培养最为关键的环节上面。

相比刘道玉的“创造教育”，今天东师提出“创造的教育”要强调什么呢？一是强调大学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摒弃功利浮躁和碌碌无为，拥抱时代和未来，实现大学的真正价值——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这里不妨说一插曲。2016年暑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瞿振元会长应邀率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部分专家学者，对东师“十三五发展规划”给予评估指导，七八位专家几乎都对学校提出的“创造的教育”理念格外感兴趣，认为目前我国高校提出教育理念的不多，而东师早在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育理念，并且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充分体现了东北师大人担当国家使命、回归大学本质、培养卓越人才的崇高情怀。专家们感慨，大学有情怀是何等重要！二是强调在教育

各环节之中（教师教、学生学、环境营造等）系统培养创造性人才，强调以经验为基础培养学生批判反思的意识、能力和习惯。三是强调师范大学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独特的战略性基础地位，回答如何让创造的精神在两代师承中生长和传递，这是与刘道玉提出的“创造教育”的重要区别。

综上对东师提出的“创造的教育”与部分先辈提出的相似教育理念的粗浅理解，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陶行知“创造的教育”是让“死”教育“活起来”，突显行动的意义；刘道玉“创造教育”是让“旧”教育“新起来”，突显教育观念更新的价值；而东师“创造的教育”是在“活起来”“新起来”的基础上，还要“特起来”，突显教师教育在创造性人才培养中的特殊作用和特殊规律。

总之，教育理念的提出，是特定时空的产物，是与解决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教育突出问题相关联。所以，“创造的教育”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需要在具体环境中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的教育”理念必然烙上东师印记，也只有与东师鲜明的教师教育办学特色相结合，“创造的教育”理念才会更具独特性和生命力。